

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汉字与日本文化

蔡凤林◎著

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汉字与日本文化

蔡凤林◎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与日本文化 / 蔡凤林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660-1154-1

I. ①汉… II. ①蔡… III. ①汉字—影响—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H12②G1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0342 号

汉字与日本文化

著 者 蔡凤林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发行部）传 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154-1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编 汉字与日语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汉字的发展历程	3
第二节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7
第二章 汉字传入日本	18
第一节 汉字传入日本	18
第二节 日本最早的汉语文章	22
第三章 中国思想文化及律令制度传入日本	27
第一节 儒学传入日本	27
第二节 佛教传入日本	29
第三节 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确立	30
第四章 古代日本人撰写汉语文章	32
第一节 古代日本人撰写汉语文章	32
第二节 古代日本人学习汉文的方法	33
第五章 古代日本人训读汉文	37
第一节 汉文的训读	37
第二节 训点	41
第三节 辞书的编纂	45
第六章 古代日本人撰写变体汉文体文章	50
第一节 变体汉文的形成	50
第二节 变体汉文的类型	52

第七章 汉语词对日语词汇体系形成的影响	59
第一节 汉语词融入日语词汇体系	59
第二节 汉语词在日语中发生词义变异	72
第三节 汉文训读词及和制汉语词的形成	76
第四节 日语和汉复合词和日本“国字”	85
第八章 假名	90
第一节 万叶假名	90
第二节 平假名的形成	101
第三节 片假名的形成	106
第九章 汉字假名并用表记体	108
第一节 和文体与汉字	108
第二节 汉字片假名并用表记体	112
第三节 汉字假名并用表记体的合理性	116
第十章 日语汉字的音韵	120
第一节 古音	120
第二节 吴音	121
第三节 汉音	122
第四节 唐音	127
第十一章 近代以来汉字在日本的社会境遇	133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汉字废止论	133
第二节 近代以来日语汉语词的创制	148

下编 汉字与日本文化

第十二章 日本人姓氏与汉字	163
第一节 古代日本人的姓氏	163
第二节 现代日本人的姓氏	173
第十三章 日本人名与汉字	180
第一节 奈良时代以前日本人名的特点	180
第二节 平安时代日本人名的特点	189
第三节 镰仓时代日本人名的特点	192

第四节 江户时代及近代日本人名的特点	196
第五节 现代日本人名的特点	198
第十四章 日本地名与汉字	206
第一节 古代日本地名的特点	206
第二节 汉字与日本地名	210
第十五章 日本的年号与汉字	219
第一节 年号的起源	219
第二节 日本的年号与汉字	220
第十六章 日本书法与汉字	225
第一节 奈良时代以前的日本书法	225
第二节 平安时代的日本书法	226
第三节 镰仓和室町时代的日本书法	229
第四节 江户时代的日本书法	230
第五节 近代以来的日本书法	232
第十七章 古代日本的出版业	235
第一节 室町时代以前的出版业	235
第二节 江户时代的出版业	237
附录一 奈良时代以前日本主要文献一览表	243
附录二 平安时代初期主要训点资料一览表	247
附录三 平安时代主要记录体文献一览表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57

上编 汉字与日语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汉字的发展历程

恩格斯曾经指出：“从铁矿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如果说人类掌握语言意味着人猿揖别，开启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那么创制、使用文字则标志着人类向更高的文明门槛迈进。人类创制、使用文字，能够为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和效率，有利于人类社会机制的运行精致化、高效化；能够“通亿载而为津”，超越时间隧道规范地表达和永恒地记录人类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认识，有利于人类智慧的积淀、启迪和新知识的创造；能够“恢万里而无阂”，超越空间距离准确地和远方的同类互通信息，有利于人类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知识的传播。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识别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之一。一般来讲，历史上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受其影响的经济文化区域内形成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民族的诞生和语言的形成同步展开。但是，具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未必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才能产生和使用。语言和民族、社会相伴，而文字的创制和使用则是以更高的文明为社会背景。华夏民族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锤炼，如果从旧石器时代算起，这个过程长达几十万年之久，其间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史前文化，但是其文字——汉字却是在华夏民族摆脱蒙昧、走进文明社会之后产生的。

关于汉字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目前尚难断定。古代中国流传着仓

^①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颉造字的传说，但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战国之前的文献中从未记述过。最早提及仓颉的典籍是战国时期荀卿著《荀子·解蔽篇》，其中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①汉代以后，对这一句话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如《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②《说文解字·序》中也称：“仓颉之始作（书），先有文而后有字。”^③在《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为黄帝史”。^④开始神化仓颉。以后这种神化愈演愈烈。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以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附会于史前传说人物。

很显然，汉字并非由传说中人物或某一历史人物创制，而是华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创造、完善起来的文字。

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半坡村遗址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1963年出版了发掘报告书《西安半坡》，其中公布了刻写在红陶钵口外侧黑色带上的原文字。与甲骨文、金文比较后，能够释读出来的有“十”“五”“七”等表示数字的10个文字。除表示数字的文字以外，能够判读出来的文字还有“示”“矛”“艸”“玉”等字。^⑤此外，山东省莒县、诸城等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也刻有很多较大的图画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写的最早的图画文字而受到关注。

1950年，中国考古学家在郑州市西郊二里岗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商文化的商朝前期文化遗址，命名为“二里岗文化”。考古学家徐旭生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向西探寻史前文化遗址时，于1957年在洛阳东郊的偃师县（今偃师市）二里头发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命名为“二里头文化”。1960—1964年，对该遗址发掘了多次。根据数量众多的遗物和陶器的形状，学界认定“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樽的内侧刻有符号。这些符号除了“一”“二”“三”等类似

^① 王先谦. 荀子集解：下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401.

^② 刘康德. 淮南子直解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50.

^③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中华书局，1963：1.

^④ 王充. 论衡 [M]. 长沙：岳麓书社，1991：38.

^⑤ 于省吾. 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 [J]. 文物，1973（2）.

数字的简单符号之外，还有 24 个形体稍复杂的符号。从整体上观察，这些符号的结构和书写方式与殷商甲骨文存在相似点，二者之间有关联。

晚于“二里头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樽内侧也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1959 年出版的《郑州二里岗》登载了其中 18 个符号的拓片。加上安志敏撰《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① 以及赵全古、韩维舟等人撰《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② 所载 9 个符号的拓片，符号总数达到 27 个。其中数字和简单符号占多数，但也有结构复杂的符号，甚至杂有和甲骨文“戈”字类似的符号。

另外，随着近年来对长江下游环太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 年）的考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较多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调查统计，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总数已超过 600 个。其中部分字符排列有序，重复出现，符合文字的一些特点。^③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中国最早的较系统、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灼烤献给神灵的兽骨，询问神意、预知未来的占卜形式，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就已出现。所用材料除牛、羊、鹿、猪骨之外，还有龟甲。占卜的方式是在兽骨背面凿成一个凹面，然后对火炙烤，根据兽骨表面上出现的裂痕（即“兆”），判断吉凶。这种占卜方法在商代中期大体完成。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记事辞。卜辞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商王对先祖的祭祀，对境外族的征伐，祈求农业丰收以及畋猎、出行、气象、地理、人物、营造、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家族、臣庶、俘虏、奴隶、占卜、文字等，俨然是一部记录商王平日处理日常生活的日志。甲骨文因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由清末金石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作为中药的“龙骨”上首次发现，并确定为汉字。最早的甲骨文著录书是刘鹗辑《铁云藏龟》（1903）。其后不久出版了孙诒让撰《契文举例》（1904）、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和《殷墟书契考释》（1915）、林泰辅撰《龟骨兽骨文字》（1921）等有关甲骨文的早期著作。

^① 安志敏. 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 [J]. 考古学报, 1954 (2).

^② 赵全吉、韩维舟、裴明相、安金槐. 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 [J]. 考古学报, 1957 (1).

^③ 陶枫、夏涛. 《良渚刻画符号》聚焦中国文字起源 [N]. 光明日报, 2015-06-10.

迄今发现的刻有文字的甲骨兽片达十六万片以上。根据这些资料统计，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共计 4600 余字，虽经过广大学者的辛勤考释，但目前能够识读的尚不足千字。^① 甲骨文已经比较复杂，包括名词、代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几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 170 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绝不是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书体还有“金文”，也叫“钟鼎文”，是指殷商到春秋战国时期铸刻在各种青铜器上的铭文。至西周时，金文已较为流行。使用金文撰写的现存最长的文章是“毛公鼎”铭文，字数近 500 字。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也称“籀文”，因其主要收录于西周宣王的太史撰识字教科书《史籀篇》而得此名。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文字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各诸侯国因不相统一而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在战国七雄中，大体上秦国用大篆，其他六国使用“六国古文”（也是一种篆体文字）。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令全国统一使用由李斯等人在大篆基础上简化而成的小篆。随后，小篆又转变为隶书（叫作“隶变”）。小篆字体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汉字，极大地提高了书写速度，而且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隶变使汉字进入了更为定型的阶段。在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而小篆主要用于刻印章、铭文。汉朝以后汉字字体又发展为草书、行书、楷书。之后，汉字字形虽然继续简化，但字体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就是以楷书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美观，称为“宋体”。明朝后期模仿宋体而加以变化的字体叫作“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多为“宋体”。

如上所述，汉字是五千年前就生息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先民在生产劳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创制出来的文字。汉字是形、音、义结合的表意文字，蕴藏着中华文化的精魂，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命脉，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主要载体。历史上，黄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是

^①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34.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影响深远、自成体系的几大文明体系，但是在这些文明中唯有黄河文明不绝如缕、海纳百川般地延续发展下来，为世界各国文化源流所仅见，这和汉字在文化嬗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也曾灾祸连绵，兵燹不绝，而一个个方块汉字，就是一块块砖石，当其排列衔接时就仿佛垒砌成了一座广阔而坚固的壁垒，牢牢守卫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形态，庇护了一代代呼吸沐浴其气息的国人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个方块汉字垒砌而成的文化壁垒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又一万里长城。瑞典中国学学者伯伦哈尔德·卡尔格连曾说过：“中国人失去汉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消失的时候。”这是中肯之论。

第二节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1. 汉字在中国版图内传播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社会生活的丰富化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是人们创制、使用文字的主要动因；同时，文化的传播推进了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一种发达文化的传播，往往创造出同一文化圈，也造就出同一文字使用圈。亚洲南部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中国西藏地区，历史上曾直接从印度输入佛教，形成了广大的佛教文化圈，故而使用的文字很接近，形成梵文文化圈。此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亚洲，这里的很多国家使用阿拉伯文字。例如，属于印度语言圈的巴基斯坦，属于波斯语言圈的伊朗等国，今天都使用阿拉伯文字。阿拉伯文甚至在讲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土耳其以及讲南岛语系语言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曾使用过。同样，在斯拉夫民族中，信奉希腊正教的国家使用源于希腊文的文字，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使用拉丁文。^①

历史上，主要是由于汉唐等强大封建王朝的横空出世，空前地拓展了我国中原文化的辐射范围，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超越语言和民族界限而使用汉字、汉文表达思想、沟通信息、利用儒学和中国佛教治理国家的文

^① 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化共同体，这就是汉字文化圈。^①

首先，在中国境内，受灿烂辉煌的唐朝文化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相继兴起了渤海国、西夏和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这些政权均采用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并积极倡导学习汉字、汉语。例如，渤海国存在的200余年间，为了采用唐朝的政治制度及儒学，学习汉字、汉语成为其首要任务。流行于唐朝的《发蒙记》《启蒙记》《训俗文字略》《颜氏家训》等书籍成为渤海国汉字和汉语教育的基础教材。西夏国世代皇亲宗室都崇儒尚文，用汉字编写了《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融合和宣扬儒学的书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崇尚孔子，先后于上京（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到辽道宗耶律洪基统治时期，辽朝版图内汉字文化高度发展，辽道宗自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在唐朝文化影响下兴起的这些政权，对汉字文化在我国北疆地区的传播贡献巨大，扩大了汉字文化圈。

其次，上述政权还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造字原理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如西夏景宗指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主要使用会意方法创制了西夏文。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具体而言，西夏文和汉字同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汉字是方块字，西夏文也是“形体方整，类八分”。这两种文字有大体相同的构成规律。西夏文创制后，广泛用于书写公文和撰写历史、文学、法律、医学等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字典、辞书，镌刻了很多碑文，铸造了钱币、印章、铜牌。民间交往也常常使用西夏文。此外，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如《论语》《孟子》《孝经》《三略》《六韬》《孙子》《贞观政要》等汉文典籍，还从汉文和藏文翻译了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②

十世纪时，辽朝统治者也利用汉字的形体或在增损汉字笔画的基础上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沿用了汉字的横平、竖直、拐直弯的书写特点，并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字形，如“仁”“来”“田”等。自行创制的契丹大字的笔画都很简单，绝大多数都在10画以下。新创制的契丹大字有3000余字。因契丹大字不适合记写多音节的契丹语单词以

^① 西田龙雄使用“汉字文明圈”这一概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史金波文集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及契丹语语法中存在的词尾变化，所以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刺又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字形制成的拼音文字。据现有资料统计，契丹小字原字有 300 多个，原字的笔画都比较简单，多数在 6 画左右。^①

金承辽制，女真族建立金朝后，除了采用中原王朝制度和尊崇汉字、汉文之外，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还令完颜希尹等人创制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② 完颜希尹创制的女真字是女真大字。《金史》记载金熙宗“亦制女真字”，为女真小字。史籍虽然明载女真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但传世的女真字资料却只有一种类型，因为无法进行比较，所以尚难断定其为大字还是小字，现在笼统称为女真字。女真字呈方块形，笔画最多为 10 画；每字大都为单音节，也有部分表意字为双音节。^③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 50 万大军平定岭南，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公元前 207 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首都南海（今广州）。公元前 111 年南越国被汉武帝灭掉，在其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交趾等郡。从南越国时期开始，汉字文化较大规模地传播到我国南疆地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不断南移，中原文化以高密度渡淮过江涌入江南地区，进一步推进了汉字在我国境内的普及。^④

汉字对我国南方民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方块壮字的创制。方块壮字又称古壮字，是壮族人民为了书写壮语借用汉字的字形或结构创制的文字，壮语称作“sawndip”。古壮字的构造比较复杂，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所取的汉字有繁体字，也有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大部分方块壮字是按照汉字的形声字造字法创制，用一个汉字的读音表达壮语相同或相近的读音，用另一个汉字或汉字偏旁所表示的意义来表达壮语词义。例如，由左边的

^①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47.

^② 脱脱. 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72.

^③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75.

^④ 蔡凤林. 中国农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虫”（形）和右边的“宁”（声）构成的方块汉字，壮语读作“nengz”，虫子或细菌之意。用方块壮字写出的歌本、故事书，其一半以上是直接采用汉字表记，这些汉字有的是借音，有的是借义。方块壮字的创制年代尚不明确，但七世纪时已经存在。使用这一文字撰写的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献是689年刻写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①，迄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用方块壮字记录的资料主要是神话故事，涉及探索大自然奥秘，解释自然现象，解释万物的来历和人类起源，反映人类征服大自然等内容。^②

根据民间流传的经文、诗词等文献以及1989年编写的《古壮字字典》收录，得知古壮字大约有4900字和10000种异体字。^③ 1957年以后，使用拉丁文字表记壮文，方块壮字不再使用。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地名的表记还沿用着“岜”（山）或“峩”（森林）等方块壮字，也有不少汉字字典收录了这些壮字。

2. 汉字在东亚地区传播

A. 汉字与越南

从秦汉王朝设郡开始，越南受中国统辖，中越两国政治关系极为密切，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当然，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在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大规模渗透之前，越南始终属于汉字文化圈，而且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历史上受中国文化浸润最为浓厚者首推越南，诚如冯承钧在《占婆史》译序中所说：“昔之四裔漫染中国文化之最深者莫逾越南。”^④

汉字约于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越南称汉字为“儒字”，是越南使用的第一种文字，历史上无论是官方文告或者是科举考试都用汉字。重要的史学、文学、医学等著作也用汉文撰写。从李朝到陈朝末年的400余年当中（1009—1413），用汉文撰写的官书和个人著作尚存33种。越南人亲切地称

^① 此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麒麟山石牛洞。全文包括序和四言颂诗二首，五言诗一首，共17行，381字，楷书。

^②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27—228.

^③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古壮字字典 [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④ 马司培罗. 占婆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汉字为“Chu ta”（意为“咱们的字”），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大约在十三世纪初，越南人感到汉字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于是采用汉字的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一种新的表意文字“Chu nom”（“字喃”，意为“南国之字”）。字喃的形体与壮字相同，是一种摹乳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大致借用汉字十分之七八，补充字喃十分之二三。字喃在李朝（1009—1225）碑文上就已出现，李朝一些学者开始用字喃写碑铭。

到十七世纪后半叶，随着越南农业生产的扩大以及黎朝（1428—1789）推行的排外主义政策导致大量华人移居越南农村，汉字、汉文开始渗透到越南农村。以此为契机，越南独自的汉字文化开始发展。学习汉字、汉文的知识分子增多，汉文的抄本和印刷本也普及，在农村开设了很多私塾，培养了农村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汉字在越南的普及，字喃也开始在越南广泛使用。使用字喃撰写的越南语文学“字喃文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一部分政府文书和村落文书也曾用字喃撰写。但是，由于字喃本身的难解等缺陷，不适合大众化，因此未能取代汉字的正统地位而成为越南的民族文字，也未能形成汉字字喃并用表记体。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翌年，法国在越南南方推行拉丁化拼音文字。这种拼音文字据说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为在越南传播基督教（天主教）而设计，起初是在基督教徒中使用，十九世纪时超越基督教徒范围而普及到越南社会。1945年越南独立以后以上述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称为“国语”，废止汉字，字喃也成为历史上的一种死文字，现今通晓字喃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①

B. 汉字与朝鲜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历史久远。《史记·朝鲜列传》的以下一段记载很能说明上古时期的中朝历史关系。

朝鲜王满^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𬇙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

^① 陈玉龙等. 汉文化论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田中恭子. 東南アジアの漢字 [C]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 朝倉漢字講座 5 漢字の未来. 朝倉書店，2004.

^② 《史记》《汉书》记作“王满”；《后汉书》《三国志》以后的史书称为“卫满”。